

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马智全 肖从礼

(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2011年8月25~26日,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召开,这是继1991年兰州国际简牍学研讨会之后在甘肃召开的第二次国际性简牍学研讨会。来自日本、韩国、美国以及中国内地和香港、台湾地区的18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提交会议论文115篇。与会代表围绕20世纪以来国内外出土的历代简牍帛书展开了热烈讨论,总结了简牍学百年来取得的成果,瞻望了简牍学的发展前景,是简牍学界相互交流、学习的一次国际盛会。此次会议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数量众多,涉及面广,本文主要从西北汉简专题研究、秦简研究、其他汉简研究、三国吴简及晋简研究、楚简及古文字研究五个方面进行介绍。

[关键词]甘肃;西北汉简;简牍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K87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22-0025-05

一、西北汉简研究

西北汉简研究是本次研讨会的重点所在,因为甘肃是汉简大省,而敦煌汉简、居延汉简、悬泉汉简等材料又对简牍学界产生过重大影响,本次讨论会又在甘肃举办,因此,西北汉简的研究格外引人注目。

(一)敦煌汉简研究

2008年,敦煌一棵树烽燧出土简牍10余枚,李正宇《敦煌一棵树烽燧新获汉简释文》对其中的两枚汉简作了考释,一枚为簿籍,是郑宽中幕客田博的雇佣名籍,另一枚为西晋“元康三年候符信”。该研究对于了解晋代敦煌地区的边塞管理有一定价值。李永平《元康三年候符信考略》认为,该符信反映的是西晋时期军民联合的边塞防御制度。宋超《汉简中的簿籍的性质》利用敦煌汉简考察了匈奴名号从“降奴”到“恭奴”的变化过程,认为这不仅关涉新莽时期与匈奴的关系,而且对东汉初年的影响甚大,是汉匈关系紧张的直接证据。在具体简文的考释上,邹文玲《敦煌汉简“候普致左子渊书”校读》一文对该简作了新的考释,对句读也作了新的调整。杨芬《读敦煌汉简〈儿尚与杨掾书〉》一文认为,该简揭示了私人书信所包含的汉代戍边政策方面的信息。

(二)居延汉简研究

居延汉简是西北汉简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本次研讨会的热点所在。王子今《居延〈盐出入簿〉〈廩盐名籍〉研究:汉塞军人食盐定量问题》结合居延汉简中的《盐出入簿》和《廩盐名籍》,考察了汉塞军人食盐定量问题,认为居延食盐量之高与河西地方盐产资源的充备有关,也与普通士兵劳作的工作量有关。杨剑虹《汉简中的簿籍的性

质》对居延汉简中的粮食簿和廩名籍、俸禄簿与吏奉赋名籍、戍卒衣物名籍等簿籍作了分类研究。孙闻博《河西汉塞军人的生活时间表》结合居延汉简中的劳作簿籍对河西汉塞军人的生活规律作了细致探索。在相关制度的研究上,王文涛《陈直先生〈居延汉简研究·名籍制度〉补论》结合陈直《居延汉简研究·名籍制度》,对汉代“名数”、“名籍”、“户籍”作了新的探索和研究。杨眉《居延新简汉律分类》对《居延新简》中保存的律令进行了分类整理,据此可以了解汉代法律的执行情况。安忠义《汉代烽火制度再考》认为,汉代烽火信号主要有烽、表、苣火、积薪、烟五种,鼓不应为烽号,而应是作报警之用。于志勇《规制和尺度:考古资料所见汉代西北边郡军事建置——兼论汉代西域都护府址(提要)》通过考古调查资料的统计,就汉代西北边郡军事建置的不同等级、类型进行了考古分类,提出汉代边郡军事建置因等差不同,存在一定规制。册书复原研究方面,沈刚《居延汉简册书复原方法述论》对居延汉简册书复原方法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看法。赵凯《居延汉简“敞欲言变事案”考释》对该简册作了复原与考释,认为该册书实际上是与“上言变事”行为相关的司法爰书,对了解汉代“上变事”程序与“留难变事”犯罪具有重要价值。宋艳萍《居延新简“厌魅书”考析》对“厌魅书”从内容、形式上作了考察,认为该简以厌劾鬼神为目的,简文记载以“制日”厌魅,反映了秦汉时期择日术的盛行。在运用居延汉简进行史地考证方面,李炳泉《破解汉代河西四郡之谜》认为西汉在设立河西四郡之前曾设立过“河西郡”,这对于认识汉代河西的开发历程具有重要意义。王海《班固在居延活动的新证据》考察了居延新简中的“大将军”和

“中郎将”,认为“大将军”指窦宪,“中郎将”指班固,并借此考证了班固在居延地区的活动以及东汉永元初居延与北方民族的关系。刘再聪《居延里程简所记高平嫚围间线路的考古学论证》结合居延里程简等简,从考古学角度对高平嫚围间的线路作了考察,对于了解丝绸之路东段路线具有参考价值。此外,高启安《汉魏河西饮食三题》结合居延汉简等简文对汉代河西饮食文化中的烹炒技术、炊帚使用以及煤炭交易问题作了考证。张东《汉代河西酒价略考》一文通过对西北汉简材料的梳理,认为尽管不同历史时期酒价变化明显,但其都与粮食价格有直接联系,能够反映出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日)藤田胜久《汉代檄的传达方法及其功能》考察了居延汉简中檄的特征,并就檄与觚的关系作了考辨,总结了汉代檄传递的方法及其功能。(日)初山明《日本居延汉简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则对日本居延汉简的研究作了回顾,对以森鹿三、藤枝晃、永田英正等学者所运用的古文书学的方法予以了肯定,并对今后的研究作了展望。

(三)肩水金关汉简的研究

初昉和师宾合著《再释秦胡——兼与胡小鹏诸先生商榷》一文利用肩水金关汉简等文献资料,对秦胡诸问题作了进一步阐明、补充。认为1974年居延甲渠侯官遗址所出《毋作使属国秦胡卢水土民》册中的“属国秦胡卢水土民”一语,言及隶属、民族、地域、身份四事,互相限定、说明,所指即卢水胡。“秦胡”指其族属,为秦时之胡入汉今已“汉化”,以示与匈奴胡相区别。但也可能为总称,即秦时文明程度接近于汉的东胡、楼烦、义渠、乌氏、月氏等诸戎胡,卢水胡只是其中之一。赵宪亮《〈甘露二年丞相御史书〉册考释补议》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肩水金关出土的《甘露二年丞相御史书》作了补考,并就该册书的性质作了讨论,认为该册书确属通缉文书。肖从礼《汉简所见“偃检”蠡测》考察了金关汉简中出现的“偃检”一词,认为肩水金关中的“偃检”是专门用于客田之类所用传上的附件,偃检实际上传的代称。同时认为西北汉简中的“斗封检”、“牛头检”、“緌检”等专名也实有所指。

(四)悬泉汉简的研究

悬泉汉简的研究是近20年来西北汉简研究的重点,也是本次讨论会最为人关注的内容之一。在册书的研究上,邢义田《敦煌悬泉失亡传信册的构成》对历次刊布《失亡传信册》的图版和释文作了细致比勘,考察了该册书的构成,认为该册书前五简与后六简互不相干,应该分为两册,后六简当属于某份简册的后半部分。利用悬泉汉简考释汉代河西驿置机构亦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热点,李并成《汉酒泉郡十一置考》结合悬泉里程简,在实地考察及有关文献记载的基础上对酒泉郡十一置的设立及其位置

进行了详细考证。张俊民《汉代敦煌郡县置名目考——以悬泉汉简资料为中心的考察》结合悬泉汉简对敦煌郡县置名称进行了考察,认为敦煌郡九个置中可以确认的只有八个,一些学者提出的玉门置和效谷置的问题仍存有疑问,敦煌郡九个置目前仍然缺一个确切名字。(韩)金庆浩《秦汉简牍〈行书律〉〈里程简〉所反映的地域统治》结合悬泉里程简考察了汉代的边郡统治,认为里程简反映了内地与西域的经济交流,对于认识汉代中央集权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侯旭东《从朝宿之舍到商铺》考察了悬泉汉简“郡邸”的资料,认为汉代“郡邸”不仅是官吏进京的住所,也是官吏私下交往的重要舞台。高荣《论秦汉的传信》认为传信作为出入门河津关的通行证,在行式上要注意持传者的姓名、身份、出行事由和目的地及沿途可享受的车马食宿,传信的发放与使用有严格的管理。利用悬泉汉简的材料研究西域问题是学术界的关注点之一。毕波《考古新发现所见康居与粟特》结合悬泉汉简《康居王使者册》和近年来在哈萨克斯坦发现的粟特语铭文考察了康居及五小王问题,认为汉文史料中的“苏薤”其实是粟特的译音,但它具体所指应是后来《新唐书》所记的康国,而非史国。袁延胜《悬泉汉简“户籍民”探析》结合悬泉汉简“使户籍民迎天马敦煌郡”的记载,对汉简中的“户籍民”进行了考察,认为汉代“户籍”上登记的人,就是“户籍民”,刑徒、奴隶于非“户籍民”,西域诸国之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户籍民”。悬泉汉简中还有一些典籍文献,(韩)尹在硕《中国西北地区出土〈论语〉木简一考》即对悬泉汉简中的《论语》简作了考察,认为悬泉汉简中的《论语》木简使我们了解了当时悬泉置吏员的文化素养及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已深入到内地乃至边郡知识社会内部。此外,吕世浩《汉代时制初探》结合悬泉时称简对汉代时制作了考察,认为汉代的确实行十六时制,但十六时制的具体名称却是随四季不同,以求符合实际的天象。悬泉置遗址所出月令诏条是一份相当特殊的文件,在政治与学术思想上都有重要的意义。自刊布以来一直引起学界的注意,施昱丞《西汉时令思想的政令化》一文将平帝元始五年(5)的这份诏条放在整个汉代时令思想演变的进程中,对月令诏条在政治与思想上的意义进行了深入分析。

对悬泉置遗址出土纸的性质及时代亦有学者关注。韩华《由纪年汉简看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纸张的年代》认为悬泉纸张的时代当为西汉时期。王元林《考古学视野下的简纸并用时代》结合悬泉置等地出土纸张的情况,从考古学角度对古纸的起源与使用作了通考,认为我国早期古纸至迟在西汉中期已经出现,简纸并用的时代较长,到西晋中后期纸张才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

二、秦简研究

(一) 岳麓秦简的研究

秦简研究以《岳麓书院藏秦简(壹)》的刊布而引人注目。陈松长《岳麓秦简〈占梦书〉的篇题与结构小议》就岳麓秦简《占梦书》篇题的确定与文本结构的处理作了介绍。鲁家亮《岳麓秦简〈占梦书〉零拾之二》对《占梦书》三处简文提出了不同的释读。凡国栋《岳麓秦简〈占梦书〉校读拾补》对岳麓秦简《占梦书》中的“变气”、“腊”、“立”、“燔洛”、“未”、“筭”、“天口”、“彭”等字词进行了考释,有助于简文的理解。黎明钊《兴利除害:岳麓书院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读记》对简中的“兴利除害”作了考察,认为“兴利”指兴办对国家和社会有利益的事,“除害”指除去对国家和社会有危害的事,这对研究秦代吏治具有重要意义。于振波《岳麓书院藏秦简〈质日〉札记三则》对岳麓秦简《质日》的质日主人、地名、亡尸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二) 放马滩秦简的研究

《天水放马滩秦墓竹简》的刊布为秦代《日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材料。李忠林《出土择吉文献〈日书〉的科技史料价值》认为《日书》是出土简帛文献中最为普遍的择吉文书,有着极为难得的科技史史料价值,并以天水放马滩乙种《日书》为例,阐述了此类文献在研究早期历法、天文学和律学中的史料价值。晏昌贵《放马滩、睡虎地、孔家坡三种〈日书〉之比较》通过对《日书》的整体比较,认为睡虎地秦简与孔家坡汉简比较接近,而放马滩秦简则相差较远。汪桂海《秦汉农业生产中的信仰习俗》利用出土简牍《日书》类文献,从七个方面论述了秦汉时期农业生产中的信仰习俗。(日)名和敏光《关于放马滩日书直室门研究》对放马滩秦简《日书》的直室门作了考察。此外,天水放马滩秦代木板地图亦有论文讨论,雍际春《论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的绘制技术及其历史地位》论述了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的绘制技术及其历史地位,认为放马滩地图形成了统一的图式体例,有基本比例概念,以水系为基本框架,地图的准确性较高,是中国古代区域专题图的代表作,奠定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基本规范。

(三) 里耶秦简的研究

里耶秦简久为学界所期盼,就已经公布的一些材料而论,游逸飞《里耶秦简 8-455 号木方选释》对里耶简 8-455 号木方内容进行了考释,并对其性质与功能作了探讨。蒋非非《简牍史料与早期中华帝国之理性行政》对里耶秦简中的“祀先农”简进行了考析,认为里耶秦简“祀先农”简是县仓制作的账簿文书,其书写格式、会计专门用语、审计程序等制度设计体现了当时统治者理性行政的理念。张春龙《里耶秦简中秦郡名略析》对里耶秦简中出现的 26 个郡进行了分析,这为我们重新认识秦郡的设置

情况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四) 睡虎地秦简的研究

睡虎地秦简的内容十分丰富,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本次研讨会又有一些新的认识。赵逵夫《由秦简〈日书〉看牛郎织女传说产生的时间》考证了睡虎地秦简甲种《日书》简有关牵牛织女的材料,认为牵牛织女传说的基本情节在战国时代已经形成,可以修正一些学者认为牛郎织女传说在汉代尚未形成的观点。朱红林《试说睡虎地秦简中的“外妻”》认为睡虎地秦简中的“外妻”是相对于丈夫为刑徒,妻子为自由人而言的。阎鸿中《秦律体制下的法律判断和法理言说》一文利用睡虎地秦简中的《封诊式》和《法律答问》,以及汉初张家山汉简的《奏谳书》中的案例材料,对秦律体制的法律判断和法理言说特色进行了分析。(韩)任仲赫《秦汉的复作与庶人》结合睡虎地秦简对秦汉时期的复作与庶人身份进行了辨析,认为“复作”的服刑期限为原刑期中减去二年后的剩余刑期,而“庶人”身份则是专指罪囚及奴婢出身者的法律用语,而不是平民之意。魏红友《关于云梦龙岗秦简中“亡人”的考释》一文认为龙岗秦简以及对该简的研究中对“亡人”一词的解释定为“逃亡者”之说有可商之处。并结合文献认为“亡人”有三层含义。从语言文字学上对秦简进行综合研究的有张显成和熊昌华合著《秦简用字考察》一文,该文对秦简用字进行了详尽统计。

三、其他汉简帛书研究

(一) 张家山汉简的研究

(韩)金秉骏《复原〈二年律令〉的书写过程》认为《二年律令》并不是西汉初期实际上实行过的完整本,也不是 247 号墓主生前亲自使用过的原本,应是根据墓主的遗嘱让专家抄写正本的一部分。单育辰《也谈张家山汉简中的“偏捕”、“偏告”》结合《商君书》的相关记载,认为“偏”应释为“除己方之外的他方”,并对张家山汉简中的“颇”字作了解释,认为“颇”其实是一个表示不定数量或不定程度的副词,这对于准确理解简文有重要意义。李斯《〈二年律令·爵律〉所见“不当拜爵者”新释》认为汉律所见“拜爵”或许并非专指军功授爵,还应包括普赐吏民爵,较之秦律规定范围有所扩大。

(二) 尹湾汉简的研究

尹湾汉简在本次研讨会上也有很好的讨论,高震寰《尹湾汉简赠钱名籍八号木牍读法商榷》认为尹湾汉简《赠钱名籍》的八号木牍的排序正反颠倒,可以更好地理解木牍的内容。李迎春《略论汉代的“文学卒史”》结合尹湾汉简探讨了汉代的“文学卒史”,认为“文学卒史”产生于西汉中期,有郡国文学卒史和卿府文学卒史之分。

此外,提交论文对其他国内外出土秦汉简牍帛书也

有研讨。胡平生《〈简牍名迹选2〉所刊“走马楼前汉简”释文校订》一文对新披露的6枚走马楼前汉简释文进行了新的释读。李均明《读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偶识》对长沙东牌楼简牍中的一些公文用语进行了研究考释,认为启封纪录的“发”与“开”二词以及“不处”、“正处”都是公文用语。田河《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遣册校释》对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遣册详加校释,校订原释文多处讹误,补充了新的释读意见,对正确认识该遣册有参考价值。沈祖春《〈银雀山汉墓竹简〔貳〕〉校补》对银雀山的汉简释文注释作了补正。张光裕《海外所见秦汉简牍留菴》则对他在香港所见数枚简牍作了照片展示,从字体来看,这些简牍与北京大学所藏汉简颇多相似之处。张存良《水泉子汉简〈苍颉篇〉的文字及书法特点》结合简文剖析了永昌水泉子汉简《仓颉篇》的文字结构和书法艺术特色。张玉林《秦汉县尉设置考》认为秦汉时期的县尉设置在具体的操作上具有很大的灵活性,秦朝时就出现了一尉和二尉并存的设置情况。臧知非《“闾左”新证——以简牍所见里制实态为中心》从秦汉里制和基层社会结构入手,古今学者对闾左含义的种种分歧可以涣然冰释。张啸东《秦系简牍“署书”暨其出土所见秦汉简牍书体的关系》一文讨论了署书与匾书(即扁书)的关系,认为署书亦乃史之掌书制度的沿袭之作,其书体亦沿秦至两汉简牍署书的演变而发展。贾丽英《告地书中“关内侯寡”、“五大夫”身份论考》认为告地书性质上属于移户文书。文书由料理丧事的巫者所写,目的是为死者在地下世界谋求可以免赋役的美好生活。告地书中的“关内侯寡”、“五大夫”,只是巫者方术师承规则的反映,而不是墓主的真实身份。陈巧莹《西汉徐州刺史部一带丧葬简牍类型分析》一文对江苏墓葬所出遣策进行了细致的分类整理,认为西汉徐州刺史部出土遣策的墓葬时间多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遣策的形式为写在木牍上的衣物疏,多半记载随葬的衣物或是墓主穿在身上的衣服,与荆州洞庭湖一带记载各种随葬品的方式不同。李明晓《〈先令券书〉集释》对《先令券书》内容进行集释,探讨了朱凌的身份,认定其是朱孙的长子。张文瀚《谢家桥一号汉墓告地策补释》认为告地策中的“郎中”可能是指墓主“恚”的儿子“昌”的官职或籍贯。其中的“廐”,应当是江陵县丞的名字。白岩《北京大葆台汉墓文物定名及复原商榷》一文对北京大葆台汉墓一些文物的定名作了商榷,对“樵中格”、“环首铜削”等问题进行了考辨,并就文物修复与墓葬复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大葆台汉墓的进一步发掘与展示提出了合理的建议。曹旅宁《秦汉简牍与秦汉法制史研究的心路历程》一文对高恒、刘海年、彭浩等先生研究秦治法制的经历和体会作了宝贵记录,并对张德芳、张俊民先生研究保

护甘肃汉简的情况作了生动记叙。在国外出土简牍的研究上,尹龙九《平壤出土竹简〈论语〉的记载方式》对平壤市贞柏洞364号墓出土的公元前1世纪汉代竹简《论语》的现状进行了介绍,并对竹简《论语》的记载方式作了较全面的分析。

在利用秦汉简帛材料进行古文献整理的研讨方面,马怡《中国古人书写方式探源》借助简帛材料探讨了中国古人“竖写左行”书写方式的成因。王树金《对马王堆帛书“丝栏”的新认识》认为,马王堆帛书的“丝栏”是用一根根红色和黑色的丝线编织出来的。陈文豪《简帛版本学论略》则利用简帛材料论述了简帛版本问题,认为简帛版本应包括三个方面:简帛释文的不同版本;出土简帛古籍或佚籍的不同版本;简帛研究论著的不同版本。简帛版本的研究可提供不同释文版本的对勘,除可取得善本外,更可提供学术发展史参考。

四、三国吴简及晋简研究

随着长沙走马楼吴简资料的陆续刊布,吴简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宋少华《长沙三国吴简的现场揭取与室内揭剥——兼谈竹简壹、貳、三卷相关盆号和揭剥图》就走马楼吴简的现场揭取与室内揭剥作了具体说明。杨振红《吴简中的吏、吏民与汉魏时期官吏的分野——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社会构造研究之二》对长沙吴简中的吏、吏民与汉魏时期吏民的分野作了考察,认为考察吏身份的变化对于考察汉魏之际政治社会构造具有重要意义。在具体简文的考释上,陈荣杰、张显成《〈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莧〉释文注释订补》对长沙走马楼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莧》的52处释文和注释进行了订补,有助于简文的正确理解。

在晋代木简的考释中,(美)夏德安《湖南郴州苏仙桥西晋古井J10的“正月祠先农祝文”》对2004年湖南郴州苏仙桥J10出土的5枚西晋祭神祝文简作了讨论,认为这是至今最早的官方祭祀先农的祝文,有助于了解西晋地方官吏当官的事务与经验,对于理解传世文献所载江淹等人的祭祀先农歌提供了具体的文化和社会背景。

五、楚简及古文字研究

楚简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所在,特别是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等重要先秦楚地简牍文献刊布以来,楚简一直为学术界所高度关注,本次研讨会上关于楚简的讨论亮点颇多。

(一)清华简的研究

李学勤作了《清华简关于秦人起源的一些新发现》的学术报告。他说,清华简的整理研究在秦人始源问题上有新的重大突破。新整理出一部记载周代史事的书叫作《系年》,书里叙述周武王伐纣后逝世,商纣的残余势力企图

复辟,新继位的周成王和周公发兵平叛得胜,原来纣的大臣飞廉(秦国国君的祖先)东逃到同属嬴姓的商奄,“成王伐商奄,杀飞廉,西迁商奄之民于邾,以御奴(徂)之戎,是秦先人”,即秦人的祖先。赵平安《试说〈楚居〉“羊”》认为,简文“羊”应理解为“于羊”。即古育字,本义是生。“羊”为地名,应读为常羊,见于《山海经》,为山名。《楚居》中的常羊、程、蕝这些地名对考察早期楚史具有重要意义。刘国忠《从清华简〈程寤〉谈〈尚书〉中的一处标点》认为《尚书·大诰》中的“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句应断为“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该文充分利用了出土文献来重新解读传世文献,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孙家洲《“清华简”〈耆夜〉篇读书札记》一文将清华简《耆夜》周公赋诗与《诗经》相对照,证明了《耆夜》的可信性,并从文化史角度,肯定《耆夜》所记载的“饮至”典礼,是商周之际规格最高的贵族酒会。李锐《清华简〈金縢〉初研》认为清华简《金縢》和今传本《金縢》有同源异流的关系,是故清华简《金縢》的出土,有助于我们解决一些今传本《金縢》中的经学、史学问题。吴良宝《读清华简〈楚居〉札记》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在学界对清华简《楚居》篇中所记载的几个地名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此外,马智全《论清华简〈程寤〉周文王“受商命”思想》一文对《程寤》篇中的周文王“受商命”思想进行了解析。

(二)上博简的研究

上博简是近年来楚简研究的热点。郭永秉《上博竹书〈孔子见季桓子〉考释二题》对“君子眈之以其所眈”之“眈”作了考证,认为应解为“畏”,并对“是故鱼道之君子”等句作了新的解释。李松儒《香港中文大学藏战国简的归属》从字迹角度出发,认为香港中文大学所藏战国残简的简5、简6、简8应归属于上博五《季庚子问于孔子》一篇,并对编联及释字作了讨论。郭静云《战国秦汉出土文献“宗”字通考》对上博简《周易》等篇章中出现的“宗”字作了通考,认为该字应读为“宗”,这有助于简文的理解。

此外,浙大楚简、郭店楚简、信阳楚简和曾侯乙墓简也有相关论文提交。曹锦炎《浙大楚简〈日书〉》对浙江大学所藏楚简中的3枚《日书》简进行了考释,其内容分为《玉勺》和《四日至》两篇。《玉勺》有二十八星宿的记载,为研究我国古代天文史提供了重要的文物资料。《四日至》则与占候有关,其“二分二至”及相关物候的记载,对研究古代节气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日)谷中信一《〈老子〉经典化过程(2)》一文结合郭店楚简相关记载,以黄帝言论为中心对《老子》经典化的过程作了探索。张新俊《释信阳楚简中的“韦(违)上”》对“易,夫贱人格上则刑戮至”中的

“格”字作了新的释读,认为应该释为“韦”,读“违”,并对“违上”进行了解读。罗小华《释轅》一文认为曾侯乙墓简中的“轳”当释为“播”,读为“韦”,就是《说文》中的“轳”。

对秦汉简牍帛书古文字的考释也是本次讨论会的一个热点,与会专家围绕已刊秦汉简帛材料精心考证,取得了诸多新的收获。而一些学者利用红外线技术释读简文,也有许多新的认识。在秦文字考释上,施谢捷《简帛文字考释札记(三续)》认为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中原释“富”字不误;马王堆汉墓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原释“肩”应作“肩”,读作“肩”,“四皓”确应读为“四肢”。方勇《读睡虎地秦简札记十则》也对睡虎地秦简中的个别字词进行了重新考证和解释。汤志彪《秦简文字札记两则》对睡虎地秦简中的“𠂔”字进行了考释;对龙岗秦简中的“𠂔,假人符传及让人符传者,皆与阑入门同罪”句中的部分释文进行考释,并分析了其文义。曹方向《龙岗秦简文字补释》利用红外线照片对龙岗秦简进行了补释与考证,对学界有所讨论的数处释文做了确认,对深入研究龙岗秦简有重要价值。在汉代简帛文字的考释上,刘钊《汉简“𠂔”字小议》认为西北汉简中的“𠂔”字就是“𠂔”字的初文,“𠂔”字从“土”为义符,从“𠂔”为声符。“𠂔”,也就是石灰,其主要用途是用作涂料。(日)广濑熏雄《读马王堆汉墓帛书〈脉法〉小札》认为《马王堆汉墓帛书[肆]》所附的一张帛书残片属于马王堆汉墓帛书《脉法》篇。修正了原释文的误释,“病夫眠”当改释作“病眠”;原释作“簪”字,据帛书残片当释作“掸”字,读作弹。刘乐贤《东牌楼汉简〈侈与督邮书〉补释》从古文字学和词义学的角度结合文献记载对东牌楼汉简《侈与督邮书》中的“别”、“念”、“皆悉”、“贫”和“𠂔(乏)”等字词的含义加以补充考释或提出了新的见解。

此外,本次会议还收到两篇有关青铜器铭文考释和甘肃所出青铜器铭文概述的文章,黄锦前和张新俊合著《霸伯孟铭文考释》首先对霸伯孟铭文进行考释,其次分析了铭文内容,最后对该墓的墓主和年代做出推测。秦凤鹤《甘肃出土先秦两汉青铜器铭文概述》主要是对甘肃出土先秦两汉有铭青铜器进行搜集与整理,共统计出140件器物,涉及器类30余种。这些器物对研究甘肃先秦历史与文化具有极高的价值。

综上所述,本次讨论会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可以说百年来国内出土重要简牍文献均有关涉,研究细致深入,成果丰硕,体现了简牍学蓬勃发展的良好形势。正如李学勤先生在本次会议上所言,简牍学已经发展成为羽毛丰满的独立学科,简牍学正在步入它的“黄金时代”。